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VALUES CONFLICT WITHIN THE EAST
ASIA CONFUCIAN CIRCLE

东亚儒家文化圈 的价值冲突

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between
Ancient Korea and Japan

潘畅和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VALUES CONFLICT WITHIN THE EAST
ASIA CONFUCIAN CIRCLE

东亚儒家文化圈 的价值冲突

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between
Ancient Korea and Japan

潘畅和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 / 潘畅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61 - 0775 - 1

I. ①东… II. ①潘… III. ①儒家 - 传统文化 - 研究 - 朝鲜
②儒家 - 传统文化 - 研究 - 日本 IV. ①B312②B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30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微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篇

中国儒学融入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文本层面研究

第一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 及其特点	19
第一节 儒学的传入 / 19	
第二节 朝鲜儒学的发展 / 32	
第三节 朝鲜儒学的特色 / 40	
第二章 （孔孟）儒学传播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48
第一节 儒学的传入 / 48	
第二节 日本儒学的着陆 / 50	
第三节 日本儒学的特色 / 53	
第三章 （孔孟）儒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及 特点比较	60

第一节	儒学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较 / 60
第二节	朝鲜和日本的（孔孟）儒学特点比较 / 68
第四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76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入 / 76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发展 / 78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特色 / 89
第五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日本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105
第一节	朱子学的传入 / 105
第二节	日本朱子学的确立 / 110
第三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 / 117
第四节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特点 / 132
第六章	朱子学传播、发展于朝鲜和日本的特点比较 144
第一节	朝鲜朱子学的制度化与日本朱子学的非制度化 / 144
第二节	朝鲜朱子学的理念型与日本朱子学的操作型 / 155
第三节	朝鲜朱子学的排他性与日本朱子学的兼容性 / 164

第二篇

中国儒学融入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层面研究

第一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171
第一节	朝鲜与儒家文化的血肉关系 / 171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与儒家文化 / 187
第三节	朝鲜与日本的儒家文化特点比较 / 199
第二章	朝鲜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典型个案 217
第一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 / 217
第二节	日本的武士文化 / 232
第三节	朝鲜的两班文化与日本的武士文化之比较 / 249
第三章	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 ... 260
第一节	自然基础：朝鲜的自然聚集与日本的人为集结 / 261
第二节	经济基础：朝鲜无商的文化与日本的商业经济 / 266
第三节	政治基础：朝鲜的中央集权与日本的多元政体 / 273
第四节	社会基础：朝鲜的血缘家族与日本的模拟 血缘集团 / 279
第五节	文化基础：朝鲜的“文”与日本的“武” / 286
第四章	结语 295
第一节	朝鲜的价值理性与日本的工具理性 / 296
第二节	朝鲜对形而上的关注与日本的形而下视野 / 299
第三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08



—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像中华文明那样一脉相承，而是经历了多个中心的发展变迁。从地中海东岸的多利亚人，到地中海西岸的拉丁人，再扩展到西北欧的日耳曼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模式，登上欧洲文明的历史舞台，相互交流与借鉴，使西方文明呈现出较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性与差异性、政治地图的统一与破裂。

与此相反，中华文明在纵横五千余里，其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东亚大陆上，从东、西、南、北、中各个不同的区域发生、发展，绵延至今。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尽管发生过数十次的朝代更迭，多次遭受游牧文化的冲击，但终究保持了文化的延续、完整和统一，而未曾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遭致毁灭或中断，也未曾像西方文明那样多次重组、整合而出新。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这种延续、完整和统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独一无二的是生存于如此大型、古老的文明周边的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奇迹般的发展史。与中国国土相连且无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的弱小国家——古代朝鲜，在泱泱大国之侧，靠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自觉地加入中华帝国的“天朝礼治体系”之中，维持了国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与中国隔海相望但始终在中华文明辐射区的日本，尽管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却呈现出更接近于西方的另类特质。

那么，为什么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地保持了文明的延续、完整和统一？为什么弱小的古代朝鲜在古老、强大的中华文明的周边得以独立地生存发展并一度还以“小中华”自居？为什么日本在中华文明的辐射区内却走向了另类？寻找答案的路径可能各有不同，但儒学文化诠释是不可回避的。

中国、朝鲜和日本自古以来在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也包括了恩怨情结，至今这种恩怨情结还深深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建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代对中国、朝韩的侵略和至今对此仍不能真诚悔过的历史现状，中韩日之间的感情冲突日益尖锐，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中韩日三国间的民族感情及文化价值冲突，并不亚于巴以领土冲突。因此，中韩日三国彼此寻求感情和解已是迫在眉睫的历史需要。寻求感情和解，首先要彼此了解，而共同作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中韩日三国要想彼此了解，深层观照儒学在三国的不同文化价值建构是个关键。

东亚儒学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古代同属“东

亚儒学文化圈”。虽然两国都位于以中国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外缘文化区，但由于两国与中国的地理、政治、文化关系的不同，儒家文化在他们各自传统文化中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韩国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在韩国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伦理”；日本学者认为，“儒教毕竟是儒教，是中国的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还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韩国和日本在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作出如此不同的价值评判，其原因何在？韩国和日本儒家文化的本质差异何在？这是必须澄清的历史课题。

中韩日三国面临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挑战，注定了要共同建构未来的区域文化，而这种区域文化的建设不可能彻底地抛开儒学这一主传统另辟蹊径。因此，中国在面向未来重构文化哲学时，必须首先深入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近邻——韩国和日本，特别是要深层次地分析儒学这一超越国家、民族的普遍主义文化与古代的朝鲜、日本民族结合时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个体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以及它至今深深地影响这些国家民族文化个性的历史现实，并展望建构未来区域文化的共同基础。这不仅对过去、更对创建未来主导太平洋时代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中韩日三国彼此认识、相互依存是历史的宿命，但三国至今都还没有深刻意识到彼此认识、相互依存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学界还没有形成全方位地掌握中韩日三国语言的学者群体，尚缺乏对中韩日三国儒学作为文化整体观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更无此类研究的系统成果。

在论述中国儒学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的定位时，大多数研究者

往往只注意中国与日本儒学的比较，而很少自觉地将韩国儒学这一重要的联系环节考虑进去，留下颇多学术遗憾。根据检索和调查，除韩国学者黄秉泰的《儒学与现代——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外，韩国和日本乃至西方学术界目前尚无此类课题的系统研究成果。因此，此课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全面认识中国儒学在其从“源”到“流”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鲜明的两种典型形态——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深刻揭示韩国和日本儒家文化的本质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加强中韩日三国哲学思想文化交流，发展中韩日三国友好关系，均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直接将中韩日三国儒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有韩国学者黄秉泰于1976年至197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儒学与现代——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40余万字的该书于199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成汉文出版。该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西方政治学、文化学的分析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韩日三国政治儒学的性质及儒学在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展望了儒学的发展未来。尽管该书极具学术价值，但由于中国学界过多地偏重于对日本的文化研究，该书翻译出版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在对区域文化研究中没有更多地注意到韩国儒学这个重要的联系环节。

虽然不是直接将中韩日三国儒学作为一个整体，但对中韩日三国儒学进行研究的还是很多的，特别是随着国际儒学会的成立，还初步形成了国际性研究热，在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了过去注重人物及区域性研究的传统方法，开始注重比较研究和合作研究。朱七星主

编的《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张立文主编的《中外儒学比较研究》、王家骅的《儒学与日本文化》、盛邦和的《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王中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比较研究》、日本尾藤正英的《日中文化比较论》、藤元（王）文亮的《中日圣人文化比较研究》等就是较为杰出的著作。朴文一主编的《古代中国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是对中国儒学对朝鲜日本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这些研究都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线索，介绍、比较、分析了中国儒学在古代朝鲜、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其与古代朝鲜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影响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属于对中国、韩国、日本儒学的平面与纵向的综述和概括，尚未应用“中国儒学影响的主体不同，则塑造的他乡儒家文化也大相径庭”这样的视角去探讨中国儒学在古代朝鲜和日本这两个不同的文化主体中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其深层原因。

目前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呈现“爆满式的国际大合唱”。国际上，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等级制度”、“耻感文化”理论，日本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土居健朗的“娇宠”理论，美国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力学关系”与“缘约原则”理论，韩国李御宁的“缩小意识”等，还有丸山真男、贝拉、赖肖尔等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理论，这些剖析日本文化深层结构和本质特点的经典性理论几乎把日本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出来。

在我国，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戴季陶、郁达夫等名人著书立说“日本论”后出现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后，近几年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又形成了一大高潮，取得了重大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不

断推出重量级学术论著：尚会鹏的《中日两国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比较》研究、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近代化》研究、范景武的《神道思想与日本文化》研究、王健的《神体儒用辨析》研究、杨薇的《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研究、盛邦和的《内核与外缘文化》比较研究，等等，不一而足。最近，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用全新的视角探讨了日本明治维新前江户思想界发生的“托儒入法”运动，论证了日本自身的近代化过程，为日本文化研究推波助澜。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哲学等方方面面，对日本特有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以及所谓“内源性”近代化等深层次文化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论证。这些研究视角之全面、论述之深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与研究日本文化热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对韩国文化的研究可谓问津者少，更缺少“通过韩国文化看日本文化”的视角。殊不知，对日本文化更深层研究都不能缺少韩国文化这一参照系，特别是对儒学的研究更不能离开韩国儒学。在日本，儒学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有争议的。不占少数的日本学者就认为：“儒教毕竟是儒教，是中国的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还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儒教的政治思想，对日本人的政治实践也几乎未曾发生影响”^①。这种观点，我们扣除其夸大的成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仅从前

①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引自〔日〕津田左右吉《中国思想和日本》，岩波书店1938年版，第89—90页。

日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世界舆论，再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中也很难说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左右其国民行为方式的国家。而韩国却与日本完全相反。古代朝鲜由于最忠实于儒家文化的理念和价值，一度称为“小中华”，而且至今儒家伦理仍是韩国具有绝对优势的生活伦理。

韩国和日本虽然是同样自觉地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国家，但由于两者是不同的文化主体，所以，对儒家文化作出了现实的不同诠释：在韩国，儒家文化作为价值理性塑造出“孝”、“仁”、“义”等普世主义的终极关怀；在日本，儒家文化作为工具理性创生出“忠”、“信”、“诚”等具体的行为原则。这种正相反的现实诠释，成为更正确地解读中国儒家文化的深沉底蕴、更准确地理解韩国和日本文化特质的宝贵佐证资料。因此，将韩国和日本的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对子进行比较研究，颇具方法论价值。本书以韩日儒家文化价值冲突为中心的用意正在于此。

二

朝鲜·韩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在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科学家研究，约在两万年前，日本列岛和大陆是连接着的。后因海水上涨，日本被大海分割为岛国。日本人的主要文化祖先是从大陆半岛迁移过去的“渡来人”。这一“渡来人”的主体是朝鲜半岛之民。“在所有的渡来人中，来自朝鲜半岛的

渡来人最多。^①”据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研究^②，日本的石器时代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所谓无土器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是所谓绳文文化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出现了弥生时代，上承绳文时代（石器时代）下接古坟时代（铁器时代）。如果说绳文时代的基本特征是采集经济，那么弥生时代就是进行水稻耕作的金石并用时代。弥生文化和绳文文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即弥生土器是在绳文土器的传统上形成的。虽然弥生文化是在日本形成的文化，但弥生文化从形成开始就具备水稻耕作、金属器、大陆系磨制石器、纺织技术等新的文化要素，显然是受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中，如果“从弥生文化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弥生初期流行的支石墓和南朝鲜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统，以及弥生时代前半期舶载的青铜利器也在朝鲜广泛出土等事实来看，新文化的直接移入途径是朝鲜，特别是一衣带水的南朝鲜”^③。日本学者山中顺雅就说，“日本列岛各地，都有这些从朝鲜半岛迁来的渡来集团的遗址（包括以后的神社、寺院和古坟等）。但是在朝鲜半岛上却看不到三韩时代绳文人的遗址。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和渡来集团之多，以及这些渡来人在日本列岛各地建国，控制了日本列岛的史实。可以说，弥生时代来自朝鲜半岛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席

① [日]山中顺雅：《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曹章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② 郑彭年：《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③ 同上书，第12页。

卷了整个尚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下的日本列岛”^①。

日本人的祖语也是弥生人语。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化石。即使毫无历史知识，仅靠直观的感觉，我们也可以从现代的朝鲜语·韩国语和日语中推测这两个民族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如今的朝鲜语·韩国语和日语虽然写法、发音不同，但在语法、词义、语气、语感等语言的深层结构上都惊人地相似，几乎可以一对一地对换。尽管有些语言学家主张如今的两种语言表现得越是亲近，在发源上也许离得越远，但是两种语言表现得越是亲近，在发展中二者的磨合越多则是肯定的事实。据学者研究，如今的韩国和日本至今共同使用着表意、表音混合语，这在世界上也仅此两家。

朝鲜·韩国和日本如此地在种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不断发生关系。日本古坟时代（公元300—592年）至奈良时代（公元711—794年）的500年间，朝鲜半岛的许多技术匠人来到日本，发展了日本的技术文化。据《日本书纪》卷14记载：雄略天皇时从百济来了很多鞍工、陶工、画工。又据《日本书纪》卷22，推古天皇时（十八年，公元610年），又有能于色彩的云微来日本造出了纸墨。不仅如此，在采矿炼铁、金属工艺、土木建筑等所有领域，先于日本熟练于其技术的百济、新罗人起了领导者与师父的作用。据《续日本纪》卷2，大宝元年（公元710年）八月条，因得黄金被授予官职的石野连是百济人的后裔，因采矿技术和识别矿物而

^① [日] 山中顺雅：《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曹章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出名的昆解宫成也为“百济国人夫子的后裔”。可见朝鲜半岛的众多才伎也纷纷渡海到日本向人们传授技艺。^①

文化的第一象征文字（汉字）就是从朝鲜半岛传去的。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按《日本书纪》的纪年，为公元285年），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派使臣阿直歧到日本解释经典，次年经阿直歧的推荐，百济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②东渡日本给菟道稚郎子皇子进讲，正式传授汉字及其内容——儒学，成为日本文化祖师：“吾东方之国，混乎罔知觉，有王仁氏后民始识字。”^③

宗教佛教也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十月，百济王首次送去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教大法的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如意法宝，所求无不如愿。此妙法宝也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较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喇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说，我法东流。”^④ 以上是以公的渠道正式传入的记载。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半岛无数无名之辈渡航或“归化”而来以民间

① [日] 齐藤忠：《古代韩国文化与日本》，孙大俊译，韩国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81年版，第187—199页。

② 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为学王羲之的书法，命周兴嗣集王书1000字成文。《日本书纪》的285年有误。

③ 朴文一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引自[日]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卷4，“狄生徂徕”条。

④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

形式传播文化于日本。

日本大化革新的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等都直从留唐归来的百济人南渊学“周孔之教”，听讲《周易》；日本最初的教育机关“大学寮”的首席“大学头”是百济人鬼室集斯，日本的朱子学也是在朝鲜朱子学者姜沆的教授下兴盛起来的，等等。

日本学者齐藤忠在自己的《古代韩国文化与日本》一书中说：“我们常用韩日古代文化交流一词。但我们真的能如文字所说韩日古代是以交流的形式存在的吗？对此，我们不能不产生质疑。坦率地讲，只强调韩国对日本的影响会更为确切。”^①这不是说在朝鲜半岛丝毫找不到日本文化的痕迹。据学者研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一部分地区古坟中的鹿角制刀装具上的直弧文是日本文化的痕迹。但这与广泛悠久的朝鲜半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②。2002年1月30日，韩国KBS电视一台“左右世界的人物”节目中，日本前首相、至今在幕后左右日本政界的第一号人物中曾根康弘，在回答韩国教授的提问时（北京时间19点55分）说，“日本的文化是一千多年前从韩国传来的”，“日本、韩国、中国的相互协作，是宿命性的”。

总之，从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到古坟时期、飞鸟、奈良时代乃至后来的时代，也就是说，至近代以前，朝鲜半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积极的。可以说，在2000多年的历

① [日] 齐藤忠：《古代韩国文化与日本》，孙大俊译，韩国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81年版，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79页。